

JIS

第2卷  
2023  
第4期

第2卷  
2023  
第4期

# 智能社会研究

##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哈尔滨工程大学主办

智能社会研究

###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杂志公众号二维码  
官网网址 [www.jis.ac.cn](http://www.jis.ac.cn)



定价: 45.00 元

### ZHINENG SHEHUI YANJIU

## 目 次

### 智能社会与人口研究专题

- 国外智慧养老发展现状及其启示 ..... 闫 萍 王娟芬 陈知知( 1 )
- 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 ..... 殷沈琴( 19 )
- 我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梳理、应用场景、面临挑战及其对策  
..... 彭青云 张俊玲 洪焕森( 37 )
- 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失能老人居家养老照护资源整合研究  
..... 杜声红 宫佳宁 赵艺阳( 55 )
- 数字“疗郁”:数字融入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  
..... 张月云 李 奇 朱凤霞( 71 )
- 智能社会与老龄人口研究领域的文献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的研究  
..... 李春华 邹凌峰 吴梓涵( 93 )

### 研究报告

- 5G 赋能零售业的发展现状及路径简析  
..... 张彦坤 李家胜 彭建真 马文蕾(107)

## 译 文

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

——一个社会学视角 …………… 彼得·福伯格 克莉丝汀·希尔特 著  
倪燕萍 丁 琦 译(122)

交际中人工智能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 杰斯·海恩斯坦 勒内·克孜尔切克  
多米尼克·迪弗朗佐 等著 李寒秋 陈典涵 译(158)

## 书 评

乡村电商发展中的国家—市场合力

——评《沙集模式 15 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  
…………… 林禹津(177)

反思人工智能的愿景、神话与未来

——评《人工智能地图集：人工智能的权力、政治和全球代价》  
…………… 曹立坤 茅泓锴(192)

## 访 谈

在科学与社会的舞台上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教授访谈录  
……………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 贺久恒(207)

# CONTENTS

## SPECIAL TOPICS ON INTELLIGENT SOCIETY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Overseas Smart Elderly Care Development  
..... Yan Ping, Wang Juanfen, Chen Zhizhi( 1 )

Research and Design on the Mechanism of Time Banks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Blockchain  
..... Yin Shenqin( 19 )

China's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Policy Review, Application Scenario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 Peng Qingyun, Zhang Junling, Hong Huansen( 37 )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Resources for Urban Disabled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 Du Shenghong, Gong Jianing, Zhao Yiyang( 55 )

Digital “Therapy”: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on on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 Zhang Yueyun, Li Qi, Zhu Fengxia( 71 )

Research and Prospects on Smart Society and Aging Society Literature: Based on  
CiteSpace Software Study ..... Li Chunhua, Zou Lingfeng, Wu Zihan( 93 )

## RESEARCH REPOR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ath of 5G-Enabled Retail Industry  
..... Zhang Yankun, Li Jiasheng, Peng Jianzhen, Ma Wenlei( 107 )

## TRANSLATED TEXT

What Is Ethnographic about Digit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 written by P. Forberg, K. Schilt; trans. by Ni Yanping, Ding Yi(1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munication Impacts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 written by J. Hohenstein, R. Kizilcec, D. DiFranzo et al. ;

trans. by Li Hanqiu, Chen Dianhan(158)

## BOOK REVIEW

Country-Market Syner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Comment on 15

*Years of Shaji Model: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Chinese Peasants' Online Businessme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Lin Yujin(177)

The Promise, Myth and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Book Review for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ao Likun, Mao Hongkai(192)

## INTERVIEW

On the Stage of Science and Society: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phen Hilgartner

..... Stephen Hilgartner, He Jiuhe(207)

# 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

——一个社会学视角

彼得·福伯格 克莉丝汀·希尔特 著\*\*

倪燕萍 丁 旂 译\*\*\*

**摘要:**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健康指南极大限制或关闭了亲临现场的民族志研究,许多研究者因此开始转向使用微信、推特和 Discord 平台进行线上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这类日益涌现的定性研究常被置于“数字民族志”的树荫之下。然而,“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商榷。本文认为,数字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民族志学者在田野点就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进行协商,而诸如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等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并不需要这种协商来满足其认识论立场。为了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将提供一份关于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数字研究的简要综述。之后,我们会基于自身在数字社区和在地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经验(在地民族志),探讨关于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的抉择会如何促进或禁锢有意义的民族志数据采集。我们也将深入讨论如下相关问题:网络匿名的较低门槛是否合理化了隐蔽研究?匿名性会产生更丰富的数据吗?数字民族志学者应如何融入研究环境中去?数字参与可能产生何种回响?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与在地民族志共享一种认识论,使其有别于非参与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即要求研究者长期用关系型方法在田野中收集数据。

**关键词:**民族志 匿名性 参与式观察 数字民族志 定性研究 因特网混合民族志

---

\* 本文原题为“*What Is Ethnographic about Digit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原刊于 *Frontiers in Sociology* 8,经授权翻译发表。

\*\* 彼得·福伯格(P. Forberg),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克莉丝汀·希尔特(K. Schil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 倪燕萍,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系;丁旂,格拉纳达大学社会人类学系。

## 一、导论

21 世纪,诸如社交媒体等数字和交互式技术剧增,迫使以研究社会生活为目的的社会学扩展其工具箱(toolkit)(Hampton, 2017)。类似推特(Twitter)这样的平台,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数据的机会。这些数据或可用来评估诸如反移民法对公共情感的影响(Flores, 2017),或可帮助阐明政治两极化的推动因素(Bail, 2021)。使用社交媒体的美国人,从 2005 年占美总人口的 5% 上升到 2021 年的 72%(Auxier & Anderson, 2021)。随着数字生活与所谓“真实生活”或“面对面生活”间的划分逐渐模糊,定性研究者也据此改进了研究方法。虽然一些人类学家曾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深入研究过人们如何在沉浸式虚拟世界中建立社区(Boellstorff, 2008; Nardi, 2010),但今日的研究者面对的文化景观是:虚拟生活与实践正日趋标准化,并且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Bluteau, 2021)。一个可以呈现这种转变图景的例子是,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和 20 年代初“真实世界”中的暴力行为有所增加。其起因部分是专有社交媒体算法在各数字平台上大规模分享的错误信息,部分则是极端分子对互联网的利用(Ndlela, 2020; Gaudette, Scrivens & Venkatesh, 2022)。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数字交互如何与人们的线下生活共存、对其产生影响或被其影响,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去创造以数字技术为目的的研究技术,而不是经由数字技术实施的技术(Hine, 2015)。

人类学、传播学、媒体研究和信息社会学学者自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初以来,持续探索虚拟世界、社交媒体和面对面交流这几者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带来的机会与挑战(Boellstorff, Nardi & Pearce et al., 2012; Dicks, 2012; Hampton, 2017),定性社会学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期带着新鲜的活力也加入了讨论。<sup>①</sup> 当各国封锁

---

<sup>①</sup> 我们认为,美国社会学在承认网络如何在社会层面影响了社交这一问题上滞后,但是我们想要在此认可个别知名的社会学学者,他们早在当下的数字民族志浪潮之前就认识到了研究网络文化的重要性。泰勒(T. Taylor)于 2006 年发表了一项关于线上游戏文化的定性研究,同时他也是《民族志与虚拟世界》(*Ethnography and Virtual Worlds*)(Boellstorff, Nardi & Pearce et al., 2012)的编辑之一。迪拉吉·穆尔蒂(D. Murthy)较早表明了社会学内更多的数字定性研究的必要性(Murthy, 2008),科齐内特(R. Kozinet)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如何做社会学网络民族志的书(Kozinet, 2011)。

了面对面共享空间时,研究者们开始跟随人们到达数字平台上的“行动所在之处”(Goffman, 1969)。借助红迪(Reddit)论坛、照片墙(Instagram)故事和抖音国际版(TikTok),研究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严谨且有见地的定性研究。特别是对那些负担着家庭和社区责任的研究者而言,在某网络社区的长期参与既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灵活安排时间,又可以免于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以这种节奏在Discord平台上交流一周所产生的大量数据,在线下面对面环境中则可能需要6个月来采集。在过去的25年中,对社会学研究生的发表要求已经翻倍(Warren, 2019)。因此,对那些担忧面对面研究的慢节奏的研究者而言,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有望实现更快速、高效的数据采集。

社会学内有关数字民族志的会议报告、课程和文献的极速增长表明,本学科已经广泛接受了检视媒介化、网络化生活的有效性(Lane & Lingel, 2022)。主流社会学长期忽略了网络社交生活,定性数字研究的增长则标志着对这一情况非常及时的矫正。同时我们也怀疑,在不对研究过程中是否有参与式观察元素加以辨别的情况下就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定性研究时,将“数字民族志”作为笼统术语使用这一行为的有效性。在思考“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sup>①</sup>时,我们主张如下观点:在数字民族志研究中生产的有效数据,必定需要研究者对参与和自我呈现进行反思性决议,而其他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则无须如此以满足其认识论立场。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中,研究者将已有的社会人工物(social artifact)转化成数据(Lune & Berg, 2012)。相反,民族志研究要求“观察者将自身嵌入数据中”,即一种“反应式互动”(reactive interaction),意味着“即使是最被动的观察者,只要在场就不可避免地塑造着他/她的观察”(Small & Calarco, 2022: 12)。正是研究者的“共同在场”(Beaulieu, 2010)——将自身暴露于特定社会世界及其成员中(Small & Calarco, 2022)——使得一项研究项目具有了民族志性质,无论这种长期的、直接

---

<sup>①</sup> 本文标题中的问题灵感来源于P. 阿斯珀(P. Aspers)和U. 柯尔特(U. Corte)的文章(Aspers & Corte, 2019)。我们从M. 斯莫尔(M. Small)的批评(Small, 2021)中得到一些启示,也承认提供一个绝对答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将提供一些能导向更广泛讨论的方法。

的联系发生在物理空间中或是经由屏幕得以呈现,抑或二者皆有。对数字民族志而言,我们日益“深陷”的“数字景观”(Bluteau, 2021)意味着,暴露在参与者和他们生活的数字技术中可以让任何事情成为可能,从成为虚拟团体中的兽人(orc)到在照片墙上发布健身照。我们提出的这个主张并非一种把关控制(gatekeeping),相反,虽然我们在此专注的是数字民族志,但是我们也希望努力使定性数字研究的认识论更加清晰。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数字”一词来指代网络化和媒介化的社会化形式。<sup>①</sup> 数字民族志方法可能包括虚拟和线上社区中的参与式观察,同样也包括连接线上和线下世界的互动行为,如黑客活动、电竞比赛、工作场所信息系统。当然,社交媒体平台、专有算法和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或给我们带来一种感觉,即所有的民族志都是(或应该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字民族志。但是,由于技术在一个群体中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因此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种特殊模式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并列于或替代仅在物理、面对面场景中进行的民族志(我们称之为“在地民族志”)。今日的社会学学者仍在继续生产纯粹的在地民族志,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数字互动行为和记录或受法律保护(如在医院),或是尚未普及到某些社区成员(如无家可归的人),或是被权力结构有意限制(如监狱和拘留所)。我们做此区分,不是将在地数据收集置于更具权威性的地位,就像高保真音响爱好者可能会以此来类比经典黑胶唱片,又或者技术爱好者声称数字化数据采集将代表更有前景和更高效的未来(Hassan, 2022)。相反,我们认为在地民族志和数字民族志是密切相关的、日益重叠与交织的,同时我们也承认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示能(affordances)。虽然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混合民族志”(Przybylski, 2021),但我们在此整理出了这种理想化的分类比较,以考量在地民族志与数字民族志中不同研究策略的可能性、伦理与成果。

在以下各节中,我们参照探讨民族志技巧的社会学文献和我们自身的田野经验,致力于促成有关“定性研究素养”(qualitative literacy)(Small & Calar-

---

<sup>①</sup> 起初,许多关于数字民族志的讨论都关注“线上”“网络”和“虚拟”社区,这种语言有必要继续存在于我们的文献讨论中,我们将这种术语理解为更宽泛的数字民族志的特定子集。

co, 2022)和数字民族志(Lane & Lingel, 2022)的社会学对话。福伯格(P. Forberg)进行了关于“匿名者Q”(后文简称Q)的数字民族志研究(Forberg, 2022)。Q是一个起源于边缘网络论坛4chan并蔓延至全网的反建制阴谋论,在4个月的时间里,福伯格使用一部新的智能手机来关注在线群体,追踪他们的数字交流,探究这些交流如何影响算法生成的软件推荐、新闻订阅和推送通知。他还与Q的追随者建立了关系,进行文字和音频采访,紧跟相关内容和时事,并根据由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抓取的推特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希尔特(K. Schilt)则对正经历具身化(embodiment)巨变的人们进行了一项在地民族志调查,这些人包括因外科手术导致体重显著下降的人。经过协商,希尔特以研究者的身份加入了一些面谈、指导课堂与互助小组,这些均是为那些正在经历生活转型的人设计的,然后她访谈了正在经历这些改变的人与社区。

我们首先对社会学中的数字研究进行一个简要概述,进而探讨我们眼中民族志认识论核心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的自我呈现与同社区成员的民族志共同在场。第一,我们考虑研究者在田野中采取匿名、化名和公开身份所涉及的利弊权衡;第二,我们考虑不同程度的参与(从匿名“潜水者”到已知的参与者)分别会生成何种数据。当然,有关社会学民族志方法的考量已经有颇多着墨,我们重温了这些讨论,并着眼于其中民族志学者浸淫于或是穿梭于不同数字环境的经验。这些数字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匿名性、有意的失实呈现和值得玩味的身份探索构成各社区论坛的一部分;另一个特点是公开作为一名研究者出现于在地研究,也会产生被攻击或者被心存不满的社区成员“人肉搜索”的风险,这种攻击或“人肉搜索”的速度和规模是在地研究中前所未有的。我们于结论部分指出,在数字世界的民族志呈现中,使用一种更具“反思性”(reflexive)(Abidin & de Seta, 2020)和目的明确性(intentional)的方法能够促进扎实的、符合伦理的、基于数字世界的的数据收集工作,且这种方法将适用于各种研究范式的场景之中。

## 二、从 Web 2.0 到 Web 3.0 数字生活的社会学方法

定性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考量即社交互动研究。从欧文·戈夫曼(E. Goffman)的“互动仪式”(Goffman, 1967)到韦斯特(C. West)和齐默曼(D. Zimmerman)的“做性别”(doing gender)(West & Zimmerman, 1987),再到兰德·柯林斯(R.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Collins, 2004),研究者们已经把面对面互动理论化了: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互动,都可能创造一种共享的社会真实感,可能加剧污名、增强自我意识和产生集体情绪等。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渗透到美国年轻人的社会生活之后——迪努齐(D. DiNucci)将这一文化转变定义为“Web 2.0”(DiNucci, 1999)——社会学的研究与理论化却没有跟上其步伐。这种新兴的在线文化有以下特点:增长的用户生产内容,易于搭建的网站,新形式的参与式互动如博客、虚拟世界、网络游戏以及社交媒体的雏形。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些知名的民族志学者意识到了这些新社交形态的重要性:在《世界间的游戏》(*Play Between Worlds*)(Taylor, 2006)一书中,T. 泰勒深入观察了围绕网络游戏《无尽的任务》形成的复杂社交网络,并分析了她本人作为该游戏玩家的经验和她在线下粉丝讨论会中的参与式观察;伯尔斯托夫(T. Boellstorff)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民族志研究,其研究对象为在2007年收获了800万人同时在线的游戏《第二人生》(Boellstorff, 2008);纳尔迪(B. Nardi)的民族志研究则关注了在2009年拥有1000万玩家的游戏《魔兽世界》(Nardi, 2010)。然而,这些混合民族志和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中心。据我们推测,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科内与年轻群体、游戏、休闲玩乐相关的参与形式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则是跨学科的、进步的文化研究领域被忽视,让位于更政治中立的文化社会学。

第二个十年中期,随着社交媒体网站如脸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的使用遍及更年长的群体,定量社会学研究者开始留意这些可作为数据收集机制的平台(Hampton, 2017)。亚马逊众包网站“土耳其机器人”

(Mechanical Turk)的发布,使得学术研究者能以崭新的形式轻松接触上百万愿意完成在线离散任务的用户。社会学家无须支付昂贵的费用或召集本科生,只须轻击按键便能进行项目研究。社交媒体网站提供了大量的用户生产内容,计算社会学家与科技公司达成数据分享协议,使用 Python 等程序从用户画像和发布内容中“搜刮”大量数据,从而了解社交网络、政治观点、行动主义、消费者品位等的形成。从社交媒体信息中搜集数据,避开了研究中低回复率和社会期许误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等问题,因为研究者既可以接触到用户公开发布的信息,又可以从各公司收集用户元数据。研究者无须询问受访者的社交网络状况,就可以精准指出人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相互联结。不过,这些数据的唾手可得性也迅速引发了尖锐的伦理问题,涉及用户保密性、专有算法和网络隐私等(Parry, 2011)。

定性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探索社交媒体交互如何成为人们线下生活的影响因素,如艾拉娜·格申(I. Gerson)的《分裂的 2.0: 新媒体断联》(*The Break-Up 2.0: 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Gerson, 2010)。这类研究检视了线上内容创作者如何想象他们的人设与受众(Marwick & Boyd, 2011)、线上互动的线下回响(Wang, Norcie & Komanduri et al., 2011),以及生活在边缘化与偏僻地理空间中的群体的虚拟社区的扩张(Gray, 2009)。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人们的线下生活,因为技术示能仍主要体现在对面对面互动的补充。至第二个十年中期,随着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在美国变得随时可见,社会学学者开始研究人们的线上交流如何进入并塑造其线下生活——一种更为混合的民族志方法开始出现(Przybylski, 2021)。城市社会学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创新,如莱恩(J. Lane)和斯图尔特(F. Stuart)使用在地民族志和数字民族志来追踪贫困社区中的邻里暴力如何受到社交媒体互动的驱动,即线上互动如何产生了致命性的后果(Lane, 2019; Stuart, 2020)。民族志学者米勒(S. Miller)和奥特兰(S. Outland)在一项关于年轻人与学校的研究中,探索了学生、家长和教师之间在校内外的线上互动如何以 10 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塑造着学生的学习环境(Miller, forthcoming; Outland, 2020)。在一个社区交叠的数字与在地场景中,此类混合民族志确保能发展出一种长期的

共同在场,进而满足斯莫尔和卡拉尔科(J. Calarco)对各个空间中民族志式“暴露”的预期(Small & Calarco, 2022)。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研究具象地呈现出了一些早期数字民族志学者提出的研究类型,因为他们抛弃了线上生活和“真实”生活之间的随意区分——这种区分只能为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个别最耐人寻味的问题提供先验答案”(Leander & McKin, 2003: 223)。

### (一) 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数字性?

21世纪20年代对Web 3.0的新兴讨论(Stackpole, 2022)伴随着数字民族志本身作为一种方法的规范化,即它是属于21世纪的民族志——Web 3.0的特点是去中心化、沉浸式虚拟和增强现实(如元宇宙和宝可梦GO)、区块链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纵观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数字民族志概念以代替田野点中的在地语言,例如“元领域”(metafields)、“联结”(connection)和“流”(flows)(Leander & Mckim, 2003; Hine, 2015; Airoidi, 2018)。然而,在诸多新兴研究中,我们也目睹了一种令人疑惑的“流行语民族志”(buzzword ethnography)的激增(Abidin & de Seta, 2020),意指因小众细分案例(niche use cases)而发展出的多种形式和风格的民族志。流行语民族志包含的方法有“界面民族志”(interface ethnography)(Ritter, 2021)、“话题民族志”(hashtag ethnography)(Bonilla & Rosa, 2015)和“应用志”(appnography)(Cousineau, Oakes & Johnson, 2019)等,其优越性在于在特定的和媒介化的环境中重新想象民族志。但这样的平台特性有一个缺点,即其寿命极短。这种碎片化的理论优先考虑小范围内的数字应用案例,以至于其中一些在短短5年内便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而逐渐过时。这种被我们称为“媒体民族志”(media ethnography)的方法也常常离在地民族志相去甚远,只因后者意在讲述“深入的”“社会故事”(Geertz, 1973; Murthy, 2008: 837),而且媒体民族志把社会故事变成数字故事,其研究主体是技术而非人类。

我们的确赞成一些媒体民族志学者的观点:数字民族志方法应保持对技术示能的敏感性,考虑层面应包括软硬件、用户界面、整个平台等。本质上,数字技术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的技术(能)做什么?于我们而言,数字民族志

的社会学方法能对以下内容做出关系型揭示:媒介化的社会经验如何产生了行为、交流、进程与身份,并让典型的数字属性与更广义的社会实践、规范与体验产生联系。海恩(C. Hine)为数字进程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个实用答案(Hine, 2015),她将格尔茨(Geertz, 1973)的观点延伸至数字层面,并指出:

“近经验”(experience-near)与“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这两个术语可以表现为“特定技术”(technology-specific)的参与和“中立技术”(technology-neutral)的参与。民族志学者在脸书群体中作为参与者的任务,是联结特定技术的状态更新与状态更新时表现出的中立技术社会行为。(Hine, 2015: 28)

图菲基(Z. Tufekci)关于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社交媒体行动主义的研究,可以有效地呈现海恩的构想(Tufekci, 2017)。图菲基所研究的许多行动主义活动都在脸书上进行,脸书要求初次使用者实名注册,并鼓励用户向社区管理员举报违反这一规范的行为。她的研究表明,对立阵营视举报为谴责手段而向脸书发送大量垃圾信息,出于自我保护目的而习惯匿名的行动者则被当成了对立阵营的靶子。若我们在此应用海恩(Hine, 2015)的概念,这一研究体现的是,脸书平台上举报的特定技术行为使得政治审查的中立技术行为成为可能。图菲基将这种社会现象从技术进程中抽离出来,以解答技术是否以及如何创造新的社会模式或重造、重组旧模式(Seaver, 2017)。菲利普斯(W. Phillips)的研究与此类似,展示了网络匿名性如何衍生发展出暴力与仇恨攻击人设,即骚扰(harassment)这一中立技术行为如何演变成特定技术(Phillips, 2015)。最后,西弗(N. Seaver)关于音乐推荐算法的民族志也可被划分为混合性质,因其田野点创建了诸如 Spotify 和 Pandora 等平台的在地企业办公场所,且其重点研究对象为数字技术(Seaver, 2022)。当他在阐明程序员如何基于数据流分类绘制用户画像从而生成音乐推荐时,他其实是在描绘催生了某特定技术体验的计算和工业背景,而正是这些特定技术构成了

全球听众共享的文化体验的基础。

在我们看来,各类民族志的共通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抓住技术和社会的复杂重叠”(Sassen, 2002: 365),而不是对某一数字技术功能的细节化。通过与某个数字社区内的人、地点和机制建立关系,也通过在相关平台进行近距离的技术参与,这些研究得以探讨数字技术的示能。如此一来,研究者抓住了日益网络化世界中的一些重点,启发部分民族志学者提出“不考虑线上空间的民族志研究是无法想象的”(Hallet & Barber, 2014)的论点,抑或声称所有形式的民族志方法都在日益混合(Przybylski, 2021)。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社会上仍存在一些其他空间,其中进行的研究无须关注数字平台所扮演的社交角色,或关注了数字平台也未必产生更丰富的数据,或其数字记录是受到合法保护的、拒绝或限制对社会学研究开放的。例如,黄(音, K. Hoang)指出,超富阶层“在灰色区域游走”时会为了不留下金融交易的虚拟或纸质记录而做出巨大努力(Hoang, 2022)。组织或机构的民族志研究极大依赖面对面的数据收集,其核心人员会经手受法律保护的或绝密的档案。有些场景也会主动地限制线上生活的访问权限,比如沃克(M. Walker)关于监狱服刑的民族志研究(Walker, 2022)。在不存在虚拟逃避时,与他人一起被困于“物质世界”中的狱中生活正是该意义的极端呈现。若我们把目前居住的社交世界想象为均等混合的,那么我们的研究将会存在一种隐患,即排除那些极富、极贫、极高龄或者制度化环境中人群的经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仔细思考:对我们所处的特定环境而言,哪一种或几种模式的民族志研究是最显著的?

## (二) 那么,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呢?

我们想象中的数字民族志,是将技术分析 with 敏感性融入在地民族志的社会学认识论中的,也就是强调研究者在田野中对共同在场与自我呈现的抉择。例如,内容分析、远程阅读、算法审计或用户体验研究的数字技术,都是民族志学者可采用的有效工具,但我们认为这些工具本身并不具有民族志性。对研究者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某种数据收集策略提供了何种

认知形式?在此,我们将同时列举两项研究来表明我们的观点:一项是潘诺夫斯基(A. Panofsky)等关于白人至上论坛的数字话语分析(Panofsky & Donovan, 2019),另一项是布利(K. Blee)关于白人至上群组的在地参与式观察(Blee, 2003)。潘诺夫斯基和唐纳文(J. Donovan)的主要研究问题为:公开承认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如何理解那些会揭示“非白人”血统的新基因检测技术?在了解到用户会公开发布个人基因检测结果并发起挑战以证明自身的种族纯洁性之后,两位研究者访问了白人至上主义网站 Stormfront。匿名数字空间的示能意味着,两人可以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收集到网站所发布的内容。他们选择了某个时间点上与检测结果有关的线上对话,这使他们观察到社区成员如何支持或者挑战他人的身份管理策略。与之相反,布利调查了引导女性进入、停驻、离开种族仇恨运动的社会过程。她最初的历史研究表明了白人女性在这些男性主导的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现有的社会学研究基本忽略了任何有关女性角色的参与讨论。为填补这一空白,她的研究问题专注于女性种族主义者的信仰如何发展,这样的信仰如何塑造或被其家庭与浪漫关系塑造,以及她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了其种族主义信仰。为回答这些问题,布利花了几年时间阅读仇恨小组的资料,参加线下会面与活动,进行生命故事采访(life story interview)。

这两项研究都采用社会学方法理解种族主义信仰与态度,但是他们的数据收集方法影响了他们如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运用这些概念。布利(Blee, 2003)在对种族仇恨运动中的女性研究中也引入了文本分析,她使用这些组织里产生的各类文件(如传单、小册子、广播节目)来识别成员传播的公众面向的话语。为了观察到这些运行中的话语框架,她参与了一些集会和会议,与这些群体中的女性领导者和成员建立了长期联系,并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通过进行生命故事采访,她了解到了这些运动中的女性如何在时间的推移中看待她们种族主义信仰的发展与演化,以及在这些运动之内和之外她们选择的不同路径。建立长期的、直接的关系也使其触及了参与者的情感(affects),这是难以透过屏幕和头像获得的在地民族志的示能。她得以长期且持续地与相同的人分享空间,观察她们的情感表现和身体语言。

她在这项研究中引入了民族志要素,从而得以探索“说”与“做”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潜在矛盾,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志尝试(Martin, 2003)。通过混合了文本分析、生命访谈和民族志参与式观察的多方检证(triangulate),布利得以论述白人女性如何加入和离开仇恨运动,而她们关于种族的意识形态发言又是如何(不)塑造她们的日常交往。

潘诺夫斯基和唐纳文关注线上发布的内容,从而捕捉到种族主义信念在Stormfront网站的某个时间点是如何在话语层面运作的。这两位学者从线上对话中看到了用户如何集体且公开地处理由两个因素引发的认知失调问题:一是种族血统(基因测试)的科学信息,二是有关白人种族纯洁吸引力(desirability of white racial purity)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当极右翼运动边采取边抛弃对种族的科学理解时,他们可以将该历史瞬间的一系列话语策略存档。他们也可以在用户发布相似测试结果后,通过找出哪类用户受到支持和哪类用户被奚落的模式,以此推断出论坛上的社会等级以及个别用户对应的社会立场。然而,这项研究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用户如何获得了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是否在线下生活中践行这些信仰。为获取这类数据,研究者需要改变方法。例如,他们可以采访Stormfront网站的用户,以进一步了解这些用户的信仰和态度。数字研究者已经用类似的方法获取了与罪犯或极右翼边缘群体接触的渠道(Gehl, 2016; Forberg, 2022)。又或者,潘诺夫斯基和唐纳文可以与用户建立联系并观察他们的线下生活。但是,数字话语分析中采访与观察的缺席并不是一种局限——这对我们的论点至关重要。该选择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成途径,且我们认为,其并不能够反映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的认识论立场(Lamont & Swidler, 2014; Small & Calarco, 2022)。

不同的数字研究方法也具有相似性,如诸多数字平台上研究者匿名性的独特示能、大量数据的访问权限及网络上何为公共何为私有的伦理关注。尽管样本量存在极大差异,但潘诺夫斯基和唐纳文的研究与贝尔(Bail, 2021)的研究在网络极右翼两极分化的问题上仍有诸多重叠。然而,分析数字内容并不是在进行数字民族志研究。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学者与不在场(也无须在场)于其他数字空间的在地民族志学者共享研究机会、挑战和伦理

关怀。德赛塔(de Seta, 2020)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为数字时代重温了费恩(Fine, 1993)的经典“民族志的十个谎言”(ten lies of ethnography),揭示了同参与式观察、内部知识、田野点边界的拉扯如何塑造着两种形式的民族志研究。尽管大数据浪潮中兴起的大规模内容分析和数据抓取表明,数字研究者可通过使用日益宏大和复杂的网络而变得“无所不知”,但数字民族志依然依托于微观数据。这种微观数据是根据关系型方法收集得来的,也仰赖田野中民族志学者的参与和田野资源之间的斡旋。有别于文本分析便于下载和归档数据的追溯力(Angelone, 2019),由民族志参与所获得的分析必须承认如下因素:研究者对数字平台的依赖,与匿名用户之间新兴的、发展中的关系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以及研究者自身长期在田野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 三、关于数字民族志的社会学考量： 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社会学范畴内的民族志,因此我们将着重于研究设计中的这两个方面:研究者在田野中的匿名程度(自我呈现)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共同在场)。正如我们在第一节所提及的,数字民族志提出了有关采用匿名和隐蔽研究技巧的新伦理问题。在数字研究这样的跨学科领域中,这些伦理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在那些自我呈现与研究者的安全密切相关极端案例中,比如关于暗网犯罪行为的研究中(Barratt & Maddox, 2016)。然而,在很多其他案例中,关于在公共网络论坛上创建假名或以匿名身份阅读帖子的伦理问题往往交由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和专业机构的伦理指导裁决——前者对互联网规范知之甚少,而后者尚未与“数字时代”俱进。我们将基于社会学民族志研究的认识论立场(epistemological stance)考察这些伦理问题,通过考虑数字平台的示能及类似情境下隐蔽研究(disguised research)的伦理论争,进一步探索在田野里匿名、使用假名或公开身份等方法的利弊权衡。

接着,我们讨论研究者在数字民族志和在地民族志中的参与程度。共同

在场使得研究者能以互动的、即时的视角去关注田野中的事件,而这也是民族志研究有别于采访或内容分析的重要特征(Small & Calarco, 2022)。然而,如何参与取决于多方因素,如在某场景下特定方法的可行性、研究者相较于被研究社区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以及某技巧带给研究者和参与对象的潜在风险性。在数字民族志中,数字平台的作用也是错综复杂的,决定着参与的可能性和社区互动规范。什么构成数字民族志中的参与?什么时候积极的参与是合适的?这些是当代社会学研究必须考虑而又未有决断的问题。本文的结论部分将讨论数字民族志学者在考虑网络参与对其自身、研究对象及社会的潜在危害时或将面临的特定伦理困境。

### (一) 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个社会学家:数字匿名化

作为研究者方法论中的一个工具,民族志观察或可规避一种长期困扰社会学家的研究困境,即研究参与者在采访调研中的“所说”和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所为”之间的差别。例如,在工作或学校场景中,研究参与者可能会告诉研究者自己坚信性别平等或英才统治。然而,若长期观察这些人,民族志学者或许会发现他们同样会做出某些加剧社会分层的行为(Martin, 2003; Khan & Jerolmack, 2013)。这种长期参与能够有效捕捉某一场景所独有的互动机制,而在此过程中田野调查者本身便是一个研究工具(Small & Calarco, 2022)。与此同时,公开观察人们或许会对其行为产生一种“冷却”作用。研究者通常会采取某程度的隐蔽托词(cover story),以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数据。隐蔽的程度可“浅”可“深”:浅时,研究参与者知晓研究者正在通过观察的方法采集数据,但对其具体的研究问题不甚了解;深时,研究者在场景中表现为一个完全的参与者,而场景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被观察着(Fine, 1993)。赫伯特·甘斯(H. Gans)在关于莱维敦郊外的研究中采取的是一种浅隐蔽策略,他告知当地居民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历史研究(Gans, 1967)。相比之下,克里斯汀·威廉姆斯(C. Williams)为了观察一家仓储式玩具店内顾客的互动行为,采取了一种深隐蔽策略,使自己在同事眼中仅作为一个普通的收银员而存在(Williams, 2006)。随着田野内关系的流动,同

一个研究项目或许也会发生无隐蔽、浅隐蔽和深隐蔽等策略之间的切换。

作为隐蔽研究的一种,深隐蔽虽然没有被社会学明令禁止,但受到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监管(ASA, 1999)。相关研究者必须隐去研究对象和研究场景,并仔细考虑自己的研究方法在学术发表中与发表后是否会加重对研究参与者的潜在伤害。然而,正如社会学中那些持续性的论争,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准确回应什么才是合乎伦理的隐蔽研究。我们能够接受研究者在面对面的研究中采取一些自我呈现方面的技巧,如穿上比平时更正式的衣服或展示能代表受访者所处亚文化的徽章或风格等。但如果研究者为了与执法部门建立联系而附和他本来并不同意的性别歧视言论呢(Leo, 1995)?这是否能算是一种符合伦理的隐蔽?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社会学家(以及机构审查委员会)普遍认为让一个研究生助手以秘密参与者的身份加入世界末日邪教(doomsday cult)是不符合伦理的(Festinger, Riecken & Schachter, 1956)。但与此同时,一些引发社会学众怒的隐蔽研究也带来了宝贵的关于不平等和歧视的深刻见解(Nardi, 1996)。然而,随着社会学内有关“去隐蔽”(unmasking)的讨论的兴起和对数据透明化的号召,采取深隐蔽策略的在地民族志学者越发受到期刊评审员、机构审查委员会和社会公众的审查。

互联网上关于用户身份和自我呈现的预期,为深隐蔽提供了新的机会。从最早的“网络”(cyber)民族志开始,研究者就已经在探索人们如何在网上进行有关身份的试验。一类身份试验(identity experimentation)常出现在关于网络政治性骚扰和“钓鱼”的研究中,表现为试验者树立与其“真实自我”(real self)迥异的匿名人设(persona)(Phillips, 2015; Bail, 2021);另一类身份试验则表现为试验者通过树立网络人设以连接那个现有社交空间之外的、未来渴望成为的自己,如一些非二元性别和跨性别的社区中所呈现的那样(Brown, 2019)。匿名仍是大多数电子平台的默认模式,如大型网游、暗网及诸如红迪和4chan等论坛(Phillips, 2015; Barratt & Maddox, 2016)。这些场景的匿名规范降低了线上隐蔽研究的门槛。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学者必须要在与世界末日邪教成员日常面对面的交流中时刻记得自己的隐蔽托词,而21世纪20年代的研究者则可以创建一个网络人设,在公共论坛上注册账号,随后便

可开始以新手的身份逐步融入任何一个“末日准备者”的团队之中。这位研究者能够观察线上对话并截屏作为记录,而不必躲在某个教派领袖家的卫生间里忙乱地记笔记。匿名的或可追踪性弱的平台也使得研究者更易进入某些藏匿的或犯罪的团体,同时或可保护研究者免受“人肉搜索”的威胁。当然,此类匿名规范也会带来挑战,使研究者无法确定网络标签和帖子创建者的群体特征。研究者或许可以得出关于某些要素的推论,如从电子化身(avatars)和共享信息中推断出某“非自愿独身”(incel)聊天室参与者的性别,但要去验证这种推断是很困难的。就社会学的数字研究而言,缺乏身份验证的线上帖子和采访或将成为学术发表的障碍,因为审稿人通常会要求看到人口统计相关信息,就算是并不能得出普遍性结论的“少量样本”(small n)研究也不例外。

匿名为主的社区规范意味着用户不太可能期望某平台的发帖者就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就像那个经典的表情包所描述的:“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同理,用户也无法笃定诸如“@ sexyboi47”的用户名能够反映出该用户的任何外形特征(甚至该用户是否为人类)。鉴于这些网络空间的匿名规范,隐蔽其中的社会学家或许能稍微缓解由研究伦理引发的焦虑感。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匿名的网络环境中坦露身份会破坏其社区规范,并将研究者置于险地(Ferguson, 2017)。这种担忧在某些情形中或许是合理的,但本文在此重点考虑的是:在网络空间,使用匿名策略是否真的比亮明社会学家身份更有利于生成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借助福伯格关于“匿名者 Q”的数字民族志来思考这个问题。Q 是一个主要与极右翼相关联的政治阴谋论,宣称非主流互联网论坛 4chan 和 8kun 上的一名匿名用户拥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 Trump)推翻撒旦阴谋集团控制世界计划的内部消息。Q 的追随者坚信,狂热的互联网行动主义将开启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而这也导致了 Q 社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迅速涌现。虽然这些追随者亟须新成员的加入,但他们也常担心自己的社区被研究者、主流媒体或政府机构所渗透。

最初,福伯格根据研究目标创建了一个匿名账号,从而进入 Q 社区——

该方法基于他观察到的该论坛中其他用户的使用习惯。此时,福伯格的研究者身份是隐蔽的,而 Q 的追随者并不知道他的账号正以研究为目的关注着帖子和对话。福伯格在各社交媒体平台上关注某些用户,并允许互联网追踪,从而逐步衍生出算法推荐和接近 Q 的追随者的网络体验。这个方法使福伯格得以洞察 Q 运动的公共结构,如阴谋论的语境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样的内容和人设能获得关注,Q 的影响者网络又是如何试图打入主流的。由于其观察涵盖多个平台,福伯格也得以更深刻地了解 Q 成员借助数字媒体扩大宣传的过程。为了维持他作为研究者的伦理标准,福伯格并没有利用匿名账号进入社区非公开的空间。如果他想要给某成员发消息或加入某私人群组,那么他使用的便是一个可识别的、可追踪至其研究者简介的账号。研究进行了几个星期后,他便完全抛弃了匿名这一选项。虽然暴露社会学家的身份时而使他被个别 Q 的追随者“屏蔽”(block)或收到令人不快的消息,但是他发现他的策略整体上并未妨碍其进入研究的社区。我们在第二节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一点。

相比之下,希尔特在她关于重大生活变化的在地民族志中便没有考虑采取匿名或其他隐蔽的技巧,只因此类技巧在她的研究语境中毫无疑问是不符合伦理的。当她开始研究有关体重显著下降等生活巨变的体验时,她意识到这些经历于她是完全陌生的。尽管她的研究主要基于采访,但她还是希望在采访前先通过民族志式的观察了解受访者经历的全貌和他们用以描述个人生活的措辞。类似于福伯格初步观察 Q 论坛时采用的策略,希尔特从一个涵盖各阶级的、全面的论坛上筛选出一个开放式互助群组。然而,她的初步研究体现出,虽然网络上存在着很多公共群组,但是它们并非无条件地对所有公众成员开放。大多数群组由一个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管理,他们根据某人所坦露的经历来决定其是否适合该群组,这种把关模式意味着没有人可以真正地以匿名身份参与其中。希尔特观察的其他线上论坛在这些方面也大同小异。

希尔特在此有两种策略:其一,她可以表明自己社会学家的身份,继而作为一个研究者加入这些群组,这能让她获得至少一个群组的访问权限;其二,

她可以创建一个与研究主题相关的隐蔽托词,然后以隐蔽身份进入群组。第二种策略在社会学中确有先例可循,但正如大多数社会学家所判断的,希尔特认为其并不符合研究伦理。希尔特的目标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参与群组。由于这些互助群组通常会鼓励成员参与分享,她很可能不得不伪造个人经历,且这一过程会持续几周或更久。这本该是一个以心理疗愈为主的场景,成员在其中分享极其个人的体验,而研究者带来的隐蔽托词会使团体产生情感联结的错觉。这或许对研究有所裨益,却有违希尔特自身的伦理判断。她可能会无意间提供有关某医疗程序的错误信息,或因为分享了过度消极或过度积极的故事引发他人的焦虑。即便互动过程本身没有对互助群组的成员造成直接伤害,但他们在看到书或文章等学术成果发表后也会产生深深的被背叛感。希尔特决定采取第一种策略,即以研究者的身份申请加入群组。很多群组的负责人并不能接受希尔特作为研究者旁观,不过希尔特最终还是获得了进入个别群组的权限。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下一节展开讨论。

通过介绍这两个例子,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支持或反对匿名研究、隐蔽研究、深隐蔽等技巧。社会学中有非常多符合伦理的隐蔽研究,尤其以关于工作场所的民族志为代表。然而,这些民族志研究完全不同于之前提到的情形,即研究者假装附和某一宗教信仰并以其为行动纲领。不论最终数据的质量如何,这种策略都很可能给研究者带来较大的情感压力。我们强调,关于匿名和隐私的问题往往是依具体情况而变的,且影响着两个任务之间的平衡:既要尽可能收集丰富的民族志数据,又要将对研究者和受访人的伤害降到最低。在福伯格的研究中,推特用户默认并习惯于匿名,而脸书用户则会期待某账号名字和图片对应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身上。在希尔特的研究中,互助小组的成员可通过仅使用自己的名(隐藏姓)以实现部分匿名,但这些群组会期待成员们共享某种个人经历,如减重手术等。即便对相互间的个人身份信息知之甚少,大家也会默认群组内所呈现的都是真实的,而这种信任进一步影响成员在面对面场景中的交流(Garfinkel, 1967)。支配这种良好关系的是群组内的一个默认前提,即群组成员都是良好的参与者,且相互共享着

面对面交流中的那种现实感。然而,大多数其他线上空间并不具备这种特征。在考虑匿名和隐蔽民族志研究的伦理问题时,这些默认前提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伦理风险较低的匿名或隐蔽研究也并不一定会比无隐蔽或浅隐蔽研究生成更丰富的数据。假如我们把希尔特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暂时放置一边,那么采取隐蔽研究或将生成更多的数据,因为研究者大概率能加入更多的互助群组。然而,这些数据的厚度或深度有待商榷。尽管她无法知道暴露研究者身份的决定已然屏蔽了哪些信息,但她依然完好地实现了研究目标,即细致理解人们如何在各场景中谈论关于生活重大变化的经历。在福伯格的例子中,网络场景中默认的匿名性为初步考察 Q 社区提供了便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匿名的策略并没能启发深刻的民族志思考。在推特平台上,机器人程序很常见,有时候甚至与那些高度活跃的、真正的 Q 的追随者相混淆,因此这个初步策略只能生成粗线条的公共叙事。换言之,如果没有和社区成员互动,进入私有群组,打破社区活动的公众假面,福伯格的初步研究会类似于一个基于动态档案(living archive)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福伯格利用这一匿名方法去探究 Q 运动内部数字平台的运作方式,而非参与者对阴谋论的实际体验。诚然,访谈往往会暴露互联网用户的线上人设是如何具有误导性的(Bail, 2021)。若我们再次暂时搁置伦理问题,假设福伯格以虚假身份进入 Q 的私有空间,尤其是那些在病毒式传播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管理下的空间,他很可能会收集到非常不同的数据,但这些不堪的数据并不一定更扎实或更有助于回答他的研究问题。虽然他亮明了自己研究者的身份,但是他发现他采访过的 Q 的极端追随者都很乐于坦率地谈论那些非主流的信仰和行为,以及他们对研究者的负面评价。

在自我呈现方面,很多数字空间比线下空间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志研究者应当时刻利用这种灵活性。在数字空间里伪装自己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维多利亚·雷耶斯(V. Reyes)在描述民族志方法的工具箱时,强调了研究者的“显性工具(如种族、民族)和隐性工具(如社会资本)”(Reyes, 2020: 221)如何被策略性地利用起来,以便借助关系进入田野

点并开始与受访者建立联系(开启、关闭、维持关系)。<sup>①</sup>不论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空间,匿名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就像希尔特和福伯格可以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参加会议或浏览论坛。然而,一名研究者若在不具备“显性工具”的情况下尝试进入一个线下空间,那就可能会面临很多阻碍,就像一个女性尝试进入男同性恋的更衣室。若我们把雷耶斯的方法应用于数字民族志,这些障碍或许更容易被克服,比如研究者可以策略性地塑造形象,把自己装扮成“同类”(insider)。不过,这种策略也会让民族志学者陷入道德困境,因为他们是在虚构的局内人面具下与受访者建立联系并展开访谈的。我们认为,虽然对于身份的探索已经出现在了在地民族志中,数字民族志也为其保留了些许空间(Reyes, 2020),但是此类策略并不一定能得到有质量的数据。对我们来说,一旦一个民族志学者使用了隐蔽人设参与互动,他就违背了他应对受访者履行的“关怀原则”(principle of care)(Boellstorff, Nardi & Pearce et al., 2012),同时这更有可能给他研究的社区以及他自己造成伤害。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在地民族志和数字民族志中关于参与式互动(participant engagement)中的棘手问题。

## (二) 疯狂点赞! 数字民族志中的“点赞”和“潜水”

民族志研究设计往往有别于其他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或多或少会参与到其研究的社交环境之中(Emerson, Fretz & Shaw, 2011; Small & Calarco, 2022)。民族志学者的角色可能是一个处于边缘的观察者,也可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参与者。这影响了田野中的人际互动,从而限定了民族志学者可考虑的问题类型和数据范围(Adler & Adler, 1987; Fine, 1993)。一些民族志学者支持在田野中进行具身化的(embodied)、“肉体的”(carnal)参与,即“有血有肉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flesh and blood)(Wacquant, 2015: 1)。例如,与其观察他人如何通过训练成为拳击手,研究者不如以自己的身体为研究工具,和社区中其他成员并肩参与训练(Wacquant, 2015)——具身化民

---

<sup>①</sup> 就数字民族志而言,我们也可以考虑“可听化”工具,因为很多网络化社交媒体有语音聊天的功能。

族志可使学者感受到布迪厄式(Bourdieuian)惯习(habitus)的形成。再如,只有当民族志学者转型为舞者,看到自己的身体和直觉随着舞蹈训练而发生变化,他才能理解那些难以通过观察和访谈传达的无意识的身体体验(Hancock, 2013)。但是,该方法隐含的对研究者能力和权限的要求却很少被意识到,且“身体社会学”(carnal sociology)中存在着性别化的、种族化的成分。例如,在城市市场景中进行具身化民族志研究的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常因亲自参与到某离经叛道的或违法犯罪的亚文化中而轻易获得来自学科的赞赏(Chancer, 1993; Small, 2015)。相比之下,在性别化的田野点(如脱衣舞俱乐部和女招待酒吧)进行具身化参与研究的女性,或将面临一些低级提问,如被质疑是否为了获得优质数据而行为过火(Frank, 2002; Hoang, 2015)。迫于压力,民族志学者不得不通过深度的亲身参与进行自证,这只会加剧少数社会学家在研究中遭遇性骚扰和性暴力(Hanson & Richards, 2019)。

某种程度上,具身化参与将研究者自身也转化为了研究现象,尽管其与直接研究对象近似程度有多高仍有待商榷。研究者就像一个观光客,会回到家里写田野笔记,也能离开田野点。或许他人会因其新技能或新文身而留意到他积极的、具身化的参与,但即便田野调查者与社区成员共享某种位置性(positionality),他边参与边观察的行为本质也注定使他有别于周遭。对民族志学者而言,什么是可知的,我们又该如何对待某种认知,都是有伦理边界的。鉴于社会学已有的深刻而漫长的讨论,这些伦理边界在在地民族志中或许有着更清晰的描述。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简要分析希尔特有关术后体重显著下降经历的在地研究中的一个例子。此例中,希尔特无法成为研究现象本身,因为她并没有接受过减重手术,也没有像一些民族方法学家(ethnomethodologists)那样尽可能通过模拟增重去理解身体机能异常的体验(Goode, 1994)。希尔特认识到具身化参与会使研究陷入道德困境,在生理层面也难以实现,于是选择加入减重手术术后互助小组。希尔特发现在较短时间内体重显著下降的经历使很多小组成员成为“实践方法专家”(practical methodologists)(Garfinkel, 1967),因为他们深刻思考了体重下降如何改变着饮食、锻炼和穿着等方面的习惯,也改变着身体的惯习和适应物理空间的

能力。

“有血有肉的社会学”这一概念显然是偏向在地研究的,它对身体参与的强调或将数字民族志学者排除在外。从威廉·吉布森(Gibson, 1984)的《神经漫游者》到21世纪20年代马克·扎克伯格乌托邦式的“元宇宙”(meta-verse),虚拟世界对很多人的诱惑恰恰在于其赋予的摆脱肉体束缚的可能性。然而,不论是坐在电脑前工作时,还是参与到虚拟的互动中时,数字民族志学者仍然是具身化的。即便是网络社区最基本的参与形式,如基于文本或表情符号的“喜欢”、转发、点赞或评论,都是具身化的互动。数字平台依据这些互动来判断内容的传播速度,从而为用户提供相似的推荐。开通了营利渠道或营利网页的油管博主和照片墙网红也会鼓励这种参与方式,常在视频结尾加上一句响亮的“疯狂点赞”,以吸引更多订阅用户。数字民族志学者能通过这些网络参与进入某个场景,和社区成员构建联系,并研究由用户参与生成的推荐算法(Forberg, 2022)。例如,研究《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子游戏速通社区的学者可以在油管上观看视频,可以订阅速通玩家的频道并评论其视频从而进入某个社区,或者可以点击“喜欢”某视频来链接到更多油管算法推荐的相关视频。在此情况下,民族志学者依然基于在地规范和习惯操作来决定自己研究的参与程度,但是其参与形式受到所处电子平台的限制,且其中没有一种参与形式能够帮助其理解速通玩家的惯习。正如早期有关电子游戏的社会学研究所强调的,理解惯习需要融合自我民族志式的具身化方法(Sudnow, 1979)。

网络空间的匿名规范使一种非侵入式的、在线下场景中难以实现的参与方式——潜水——成为可能,即在某互联网论坛或社交媒体上创建账号但极少与他人互动(Nonnecke & Preece, 2003)。潜水者或许希望加深对某疾病的了解或密切关注推特上的事件,却不希望自己无意的评论触怒网友。潜水者藏匿在某账号或某平台的成千上万的用户或粉丝之中,可能只会被关心注意力经济的市场研究员注意到。相比之下,在地的潜水多表现为在田野中观察而不参与互动,可能会直接引起被观察者的警觉。社会学方法课程的一个常规操作是让学生去某杂货店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训练田野笔记,然而在美

国那些时刻提醒人们“如果你看到什么,请说出来”(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的城市空间里,此类训练可能会招致非常危险的误解。若一个女性在公园里看着一群孩子,人们会默认她是一个母亲或保姆。但如果换成一个男性,人们便会质疑这个场景的合理性。同理,有色人种的、残障的、跨性别的或非二元性别的民族志学者在公共场所进行观察训练时更易遭受旁人(如顾客、保镖等)的怀疑和骚扰,而白种的、身体健全的、顺性别的学者却大概率能免受这种困扰。当然,这不是说在地民族志研究就无法做到一定程度的潜水。该技巧或许能应用于对窥私欲(voyeurism)更包容的环境之中(如男同性恋的公共浴室)(Tewksbury, 2002),或多数人同时处于观察状态的场景之中(如在一场抗议活动中)(Tufekci, 2017)。不过,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取决于研究空间中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交规范和研究者自身相对于他人的位置性。

在数字民族志中,潜水和边缘参与(peripheral participation)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因为研究者可以在并不改变文本的情况下点赞红迪的帖子或关注推特用户。尽管一些活跃的参与行为可以被轻易识别出来,比如给某论坛成员发消息或点评油管视频等,但理解潜水和边缘参与之间的界限还是需要研究者保持对社交语境的高度敏感和对平台特性的清晰认知。早期那种静态的、归档式的(archivable)网络环境或许很少令匿名浏览的研究者产生参与感,而如今诸如抖音国际版那种响应式的、不断变化的、以算法为驱动的平台却使得每个视频片段都成了转瞬即逝的民族志机会,因其会持续基于研究者在社交系统中的行为而生成关系型数据(relational data)。在福伯格有关Q的研究中,他在短时间内从一个匿名的潜水者转变为一个身份透明的参与者。虽然他最初采用的是虚拟的用户名,但是由于他在多个Q相关论坛上反复出现,已然引发了那些多疑的用户群体的怀疑和困惑。福伯格开始给一些用户发消息,提出采访的诉求,同时透露了个人姓名和所属大学机构。由于信息在这些平台上的传递速度非常快,他最终决定把姓名直接填写在个人页面上。在这一步骤前,以防被Q成员“人肉搜索”,他还查看了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并做好了应对猛烈抨击的准备。的确,一些人搜索了他的信息,指出他的导师是一个性别议题理论家(叹气),而他本人的研究似乎是由一个犹太

组织资助的。他也因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在私聊中受到几次猛烈的抨击。更频繁的是,他被他尝试联系的用户屏蔽,只因在 Q 的追随者眼中,他与一个自由主义的学术机构联系紧密。

对福伯格来说,抛弃匿名人设虽招致了一些不友好的信息并限制了他进入某些空间的权限,但还是促进了他与潜在参与者之间更真诚的互动交流,受访者也可以自由地询问他的背景和研究工作等。再者,他受到抨击反而启发他从新的视角去分析 Q 社区的社会行为,即在受到威胁之后 Q 社区的追随者如何捍卫自己,如何通过坚持信仰以彰显道德和思想上的优越感。久而久之,一些原本满是怒气的成员甚至也同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看到了福伯格的好奇心和真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福伯格的这个经历与他在田野中的位置性是密切相关的。Q 社区中绝大多数都是顺性别的白人,他们很可能认为福伯格是“同类”,尽管福伯格当时就读于一所精英大学。福伯格在个人页面上呈现出来的作为白人男性的显性特征,促使 Q 的追随者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他身上:一些人默认福伯格在意识形态层面是自己的盟友,并借此调侃学术圈和进步人士;另一些人则把他当成完全的局外人,从比较自己的和他的信仰中获得乐趣。因此,福伯格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这取决于他的受访者如何解读。这使他获得了进入 Q 社区的权限,却不一定适用于拥有其他社会身份特征的研究者——边缘群体往往比顺性别白人男性更易在网上遭受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Vogels, 2021)。借助福伯格的研究与其他关于网络“钓鱼”(Phillips, 2015)和暗网用户(Barratt & Maddox, 2016)的研究,我们希望呈现的是,在一个边缘的数字空间里以公开的研究者身份存在,是可以生成丰富的、交互型的数据的,并不有别于在地民族志。但这个方法确有一定风险,或使民族志学者遭受网络暴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在研究之初得到充分考虑,并在研究进程中不断得到重新评估。

从公开身份的边缘参与者到匿名潜水者,希尔特在互助小组中的角色也是有变化的,不过其潜在风险稍低。与福伯格的例子不同,希尔特和精英大学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其研究的可信度,尽管那不一定能帮助她进入一个群体。在她顺利进入一个群体后,群体领导人会介绍她是一名社会学教授,或

让她做自我介绍。在群体见面的过程中,她尽可能地顺应群体的规范。当其他成员记笔记时,她也记笔记。当没人记笔记时,她也尽量不动笔,而是稍后在自己车里用语音备忘录的方式加以记录。作为一名身处多种族、多性别环境中的顺性别白人女性,她的出现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她采用的是互助小组中常见的边缘参与,她会在其他人说话的时候点头,也会被玩笑话逗得大笑,或简单地保持微笑。在错过了她自我介绍的新成员看来,她就像一个从不发言的参与者(一个在地潜水者)(an analog lurker)。条件允许时,希尔特会向新成员介绍自己,阐明自己的角色。如果有人误以为她也经历过体重显著下降并向她提问时,她会迅速澄清自己只是一个外人(outsider)。随着时间的推移,定期参与会面的成员开始在会前会后和她互动,谈论之前发生的事情或跟她开开玩笑。一旦希尔特错过了某次会面,便会有一名成员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她当天发生的趣事,这体现出小组成员是期待她出席的。希尔特认为,她的边缘参与使她得以跟大家产生联结,从而帮助她深入理解体重显著下降如何改变着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交互动方式。小组中的成员知道她是谁,所以如果大家想的话,就可以轻易发送充满负面信息的邮件或消息给她。不过,或许是因为群主最初为她做了担保,而她也很少在活动中发言,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希尔特的研究中发生。

在结束这一节前,我们希望再次考虑数字民族志和在地民族志中的伦理问题。虽然在地民族志常鼓励“有血有肉的社会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形式的具身化参与(特别是隐蔽的)有违伦理准则。回到利昂·费斯汀格(L. Festinger)等人有关世界末日邪教的研究,如今我们很难想象那种派遣研究生成为邪教成员的研究设计,更不必说这种参与会要求新成员为了末日准备而抛弃世俗财物(worldly possessions)和自己的孩子。假使你是那个研究者,你很确定世界末日不会来临,而你的研究助手很快要离开这个宗教,那么你会给你的助手造成很大的压力,也会给这个宗教的成员带来巨大的伤害,以这些代价去换取一点实证研究的成果是不值得的。诚然,身份公开的研究者也可能在具身化参与研究中给社区成员带来伤害,如与受访者进行性接触致使其意外受孕(Goode, 2002);或给他们自己带来伤害,如拳击馆的陪打在训练

中摔断自己的鼻梁骨(Wacquant, 2015)。我们认为,社会学就在地民族志中的可为和不可为已经大致制定了一个伦理指标,而对数字民族志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然而,数字民族志中的伦理指标是很难评定的。数字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网络行为多大程度上会对“真实世界”(real world)造成损害?数字环境的特殊功能意味着,即使是边缘参与、随处点赞的行为也可能造成在地研究想象不到的社会危害。例如,通过“@ Peterforberg”或“@ sexy-boi47”点赞某个帖子,便等于把该内容推送至网上且让更多人看到。如果你研究的是韩国流行音乐明星,那么转发一个帖子或点赞一个歌星的账号不过是沧海一粟,会迅速淹没在 8900 万韩国音乐粉的网络互动中。对比之下,转发有关种族正义(racial justice)运动的帖子像是一种更激进的参与式民族志,其助力于提高曝光率,是对社区行动主义者的一种回馈。不过,相同的网络参与对研究极右运动和仇恨组织(hate groups)的学者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正如福伯格的研究表明,Q 的内容常包含关于疫苗的伪科学信息,或包含关于激发 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大厦暴乱的选举盗窃的阴谋论。在抖音国际版、照片墙或推特上点赞一个 Q 的帖子,都有可能使帖子被更多人看到,为发帖者提供营利,或表明对发帖人信仰的支持,即便这种推动作用很微小。如果民族志学者采取的是匿名人设,那么这种互动带来的风险更高,因为他们或许会被要求参与具有危害性的活动中去。就在地民族志而言,机构审查委员会很可能会判定一个支持反疫苗抗议的研究者是有伦理问题的,即便这个抗议只被少数人看到了。让我们进一步比较分析,对 Q 来说,从传播阴谋论到线上发布招聘材料,其大多数肉体的或具身化的参与都与 1950 年在地的世界末日邪教出奇的相似。唯一的差别可能是,Q 的行动几乎可以在没有任何物理接触的情况下完成。关于数字民族志,我们必须更充分地考虑边缘参与和具身化参与的伦理界限。转发反疫苗视频或点赞反疫苗帖子,可能会造成大规模错误信息的传递。虽然互联网用户可以恣意地匿名或掩盖真实身份,但我们认为,学者在数字民族志中决定研究参与度时应坚持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应时刻反省自己的伪装或人设可能会给这些虚拟社区带来的影

响,这种反省本身也是为了打破一种错觉。简言之,网络世界和所谓的“真实世界”一样真实,也一样有影响力。

## 四、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通过分析实例,我们指出,数字民族志应与所谓的“在地民族志”有着类似的研究策略,即在某社会环境中进行长期的、参与式的观察。不论一位民族志学者是关注难以追踪的、无线下组织的数字社区,还是参与到一个线上线下分界模糊的社交网络,或是研究杜绝科技的新路德派(Neo-Luddites),他都应该尽可能公开身份并直接接触田野点及其成员,这也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标志(Small & Calarco, 2022)。当然,这并不是说网络场景没有值得研究的独特的互动形式。举两个典型的例子:社交媒体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匿名死亡威胁和用语粗俗却永远无法抹除的帖子。社交平台的涌现、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激增,每天都在为社会学分析提供成熟的新型“社会人工物”。我们在此强调,在数字平台中进行的定性研究并不一定就是数字民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从米歇尔·拉蒙特(M. Lamont)和安·斯威德勒(A. Swidler)的研究,支持以“方法论上的百花齐放抵制方法论上的部落意识”(Lamont & Swidler, 2014: 154)。这两位学者提出:“方法论的选择应以研究问题为基准。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优势,亦有不同的局限性。”(Lamont & Swidler, 2014: 154)从红迪论坛到电子游戏协会再到照片墙的发布,数字话语和内容分析通过严谨分析“社会人工物”来呈现问题的时间性和历时性变化。与民族志研究不同,这些方法不能也不需要研究者长期共存于田野来支持研究的认识论立场。即便是基于这些网络空间的实时观察,也不一定会产生民族志学者及其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型数据(relational data)。

我们认为,不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民族志学者都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其作为研究者的身份是否为田野里的其他人所知?第二,其在田野里的角色是什么?如何呈现自我和如何参与田野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且与伦

理、认识论和情景式的考量息息相关。通过比较分析福伯格有关 Q 的数字民族志和希尔特基于互助小组的在地民族志,我们展现的是数字民族志如何呼应了那些我们业已熟悉的有关研究技巧的问题,并且同时开创了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的新示能。研究者在数字和在地研究中的自我呈现、参与程度,取决于其探究的研究问题、其找寻答案的空间及其如何理解该空间的规范和要求等。正如福伯格的研究所展现的,田野中的自我在场也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又如希尔特的例子,某些情况下的深隐蔽是不可能或不道德的。这两类方法的共同点在于,其审慎地考虑了研究的认识论立场,考虑了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对研究者产生的风险,考虑了研究对受访者、学科和广大社会的潜在伤害。

对我们来说,跨范式的民族志学者必须意识到某特定场景的自我呈现规范。匿名潜水可能符合一些数字社区的规范(Ferguson, 2017),然而各网络平台也在提高认证率,要求用户以真实姓名发帖并提供可搜寻的个人识别信息(Barratt & Maddox, 2016)。同时,反向图像搜索和“人肉搜索”工具的普及,意味着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以假面存在(unmaskable)。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个人安防摄像头也限制了线下匿名的可能性,就像警察能通过人脸识别软件和众包录像来确认参与 2020 年夏天由种族不公引发的社会动乱的抗议者(Vincent, 2020)。再者,在任何隐蔽或匿名研究中,其匿名性都会随着数据的发表而不复存在。尽管研究者可以策略性地创建个人页面以获得进入某社区的权限和与参与者建立联系的可能,但我们衷心告诫那种用虚假人设了解真实人群的方法。相反,我们提倡,民族志参与的重心应为建立真实的联系,并向受访者学习;在符合研究需求时,研究者亦可着重内容生产和电子游戏体验。然而,这几个目标在多数情况下也都需要研究者向受访者表明身份。

在与受访者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民族志学者应认识到其所处研究环境的行为规范,并反思其行为可能会给社区氛围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不论是数字空间里的潜水、点赞或发帖行为,还是在地空间里的观察、结交或互动行为。长期在网上潜水或在线下空间匿名观察能帮助研究者判断是否需要多方检证各种数据(Duneier, 1999),抑或潜水观察本身就能获得关于一个社区的主

要数据。在很多数字空间里,诸如点赞、关注、查看的边缘参与既合乎场景规范,又能提供关于电子系统运作和回应方式的宝贵数据。这种情况尤其常出现在受算法支配的环境中,因为任何程度的用户参与都会被裹挟进无孔不入的算法中。然而,在一些较为反常的空间里,民族志学者或将为传播危害性内容和支持危害性用户的言行负责任;假使民族志学者使用的是隐蔽的方法,其可能会被迫发布有害内容,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学者不得不鼓励宗教新成员放弃物质财产。在我们看来,为了把握田野中的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研究者不应执着于场景的可能性,而应努力探索既符合伦理准则又有助于生成优质数据的研究方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明白本文对民族志研究范式的划分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觉得过时。我们的确使用了“数字”和“在地”这些诠释词,但我们也认识到两者在很多社会语境下并不存在明确的划分。正如本文所引用的研究表明,使用“数字民族志”一词并不排除混合方法(mixed-methods)的可能性。不论是交叉研究线上线下的语境,还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或是探索迥然不同的多个数字平台,其目的都是找到最符合研究课题的方法。不过,我们在此把数字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加以区分,也是希望能提升前者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同时重申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语境的的确确需要社会学家有意识地去理解数字媒体的作用和角色。在我们设想的未来里,数字民族志大量涌现,甚至使得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区分变得毫无意义。或许在一个类似“元宇宙”的空间里,学校和办公楼等在地空间都会被取代,或许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将是混合的。然而,在当下行文的2023年,我们依然很难远距离地、无物理共存地去研究那些造成或维持结构性不平等的机构,例如监狱、公共住房、金融机构等。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都还没有惠及我们国家最弱势的群体(如受到监禁的、年迈的、无家可归的或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数字社会科学研究还无法涵盖这些人的社会环境。我们主张的是,社会学民族志研究应顺应研究对象所面临的现实情况,进而采取或单一或混合的研究方法。混合民族志(hybrid ethnography)或许的确是未来,但让我们转述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 Gibson)的一句话,我们也必

须记住的是,未来从不是均等分配的。<sup>①</sup>

### 参考文献

- Abidin, C. & G. de Seta 2020, "Private Messages from the Field: Confessions on Digital Ethnography and Its Discomforts." *Journal of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2.
- Adler, P. & P. Adler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Sage.
- Airoldi, M. 2018, "Ethnography and the Digital Fields of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1.
- Angelone, L. 2019, "Virtual Ethnography: The Post Possibilities of Not Being There." *Mid-Wester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1.
- ASA 1999, "Code of Ethics." <https://www.asanet.org/wp-content/uploads/savvy/images/asa/docs/pdf>.
- Aspers, P. & U. Corte 2019, "What Is Qualitative ab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42.
- Auxier, B. & M. Anderson 2021, "Social Media Use in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1/04/07/social-media-use-in-2021>.
- Bail, C. 2021, *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ratt, M. & A. Maddox 2016, "Active Engagement with Stigmatised [Sic] Communities Through Digital Ethnography." *Qualitative Research* 16.
- Beaulieu, A. 2010, "From Co-Location to Co-Presence: Shifts in the Use of Ethnography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0.
- Blee, K. 2003, *Inside Organized Racism: Women in the Hate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uteau, J. 2021, "Legitimising Digit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mmersive Cohabitation: Becoming An Observing Participant in A Blended Digital Landscape." *Ethnography* 22.
- Boellstorff, T. 2008, *Coming of Age in Second Life: An Anthropologist Explores the Virtually*

---

<sup>①</sup> 肯尼迪(P. Kennedy)指出,这句话可能是虚构的,但它的确可以完好地概括出吉布森的写作哲学(Kennedy, 2012)。

- Huma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ellstorff, T. , B. Nardi & C. Pearce et al. 2012, *Ethnography and Virtual World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nilla, Y. & J. Rosa 2015, “Ferguson; Digital Protest, Hashtag Ethnography,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thnologist* 42.
- Brown, J. 2019, “How Gamers Use Virtual Worlds for Safe Gender Exploration.”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gaming/gender-questioning-transgender-gamers-safe-space-vr>.
- Chancer, L. 1993, “Prostitution, Feminist Theory, and Ambivalence: Notes from the Sociology Underground.” *Social Text* 37.
-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usineau, L. , H. Oakes & C. Johnson 2019, “Appnography: Modifying Ethnography for APP-Based Culture.” in D. Parry, C. Johnson & S. Fullagar eds. , *Digital Dilemmas: Transforming Gender Identities and Power Relations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de Seta, G. 2020, “Three Lies of Digital Ethnography.” *Journal of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2.
- Dicks, B. 2012, *Digital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Sage.
- DiNucci, D. 1999, “Fragmented Future.” *Print* 53.
- Duneier, M. 1999,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 Emerson, R. , R. Fretz & L. Shaw 2011,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rguson, R. 2017, “Offline ‘Stranger’ and Online Lurker: Methods for An Ethnography of Illicit Transactions on the Darknet.” *Qualitative Research* 17.
- Festinger, L. , H. Riecken & S. Schachter 1956, *When 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ine, G. 1993, “Ten Lies of Ethnography: Moral Dilemmas of Field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 Flores, R. 2017, “Do Anti-Immigrant Laws Shape Public Sentiment? A Study of Arizona’s SB 1070 Using Twitter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3.

- Forberg, P. 2022, "From the Fringe to the Fore: An Algorithmic Ethnography of the Far-Right Conspiracy Theory Group QAn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51.
- Frank, K. 2002, *G-Strings and Sympathy: Strip Club Regulars and Male Desi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 1967, *The Levittowners: Ways of Life and Politics in A New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audette, T. , R. Scrivens & V. Venkatesh 2022,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Facilitating Violent Extremism: Insights from Former Right-Wing Extremis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34.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hl, R. 2016, "Power/Freedom on the Dark Web: 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the Dark Web Social Network." *New Media & Society* 18.
- Gerson, I. 2010, *The Break-Up 2. 0: 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ibson, W. 1984,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Books.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al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Goffman, E. 1969, *Where the Action Is: Three Essay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Goode, D. 1994, *A World Without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Born Deaf and Blin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oode, E. 2002, "Sexual Involvement and Social Research in A Fat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25.
- Gray, M. 2009, *Out in the Country: Youth, Media, and Queer Visibility in Rural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llett, R. & K. Barber 2014,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Cyber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3.
- Hampton, K. 2017, "Studying the Digital: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Digital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3.

- Hancock, B. 2013, *American Allegory: Lindy Hop and the Racial Imag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nson, R. & P. Richards 2019, *Harassed: Gender, Bodies,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ssan, R. 2022, *Analog*,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 Hine, C. 2015, *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Embedded, Embodied and Everyday*, London: Routledge.
- Hoang, K. 2015, *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ang, K. 2022, *Spiderweb Capitalism: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P. 2012, "William Gibson's Future Is Now." <https://www.nytimes.com/2012/01/15/books/review/distrust-that-particular-flavor-by-william-gibson-book-review.html>.
- Khan, S. & C. Jerolmack 2013, "Saying Meritocracy and Doing Privileg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4.
- Kozinet, R. 2011,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y Online*, New York: Sage.
- Lamont, M. & A. Swidler 2014,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Interview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37.
- Lane, J. & J. Lingel 2022, "Digital Ethnography for Sociology: Craft, Rigor, and Creativity." *Qualitative Sociology* 45.
- Lane, J. 2019, *The Digital Stre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ander, K. & K. McKim 2003, "Tracing the Everyday 'Sittings' of Adolescents on the Internet: A Strategic Adaptation of Ethnography Across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3.
- Leo, R. 1995, "Trial and Tribulations: Courts, Ethnography, and the Need for Evidentiary Privilege for Academic Researche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6.
- Lune, H. & B. Berg 2012,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Pearson.
- Martin, P. 2003, "'Said and Done' Versus 'Saying and Doing'." *Gender and Society* 17.
- Marwick, A. & D. Boy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
- Miller, S. forthcoming, *The Tolerance Generation: Growing up Online in the Anti-Bullying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rthy, D. 2008, “Digital Ethnography: An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y* 42.
- Nardi, B. 2010, *My Life as A Night Elf Priest: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World of Warcraf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ardi, P. 1996,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Twenty-Five Years after Laud Humphreys’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0.
- Ndlela, M. 2020, “Social Media Algorithms, Bots and Elections in Africa.” in M. Ndlela & W. Mano eds., *Social Media and Elections in Africa*, Vol. 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Nonnecke, B. & J. Preece 2003, “Silent Participants: Getting to Know Lurkers Better.” in C. Lueg & D. Fisher eds., *From Usenet to CoWebs*, New York: Springer.
- Outland, S. 2020, *The Connected Classroom: Juggling Technology, Distractions, and Expectations in High Schoo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nofsky, A. & J. Donovan 2019, “Genetic Ancestry Testing among White Nationalists: From Identity Repair to Citizen Sc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9.
- Parry, M. 2011, “Harvard Researchers Accused of Violating Students’ Privacy.”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arvard-researchers-accused-of-breaching-students-privacy>.
- Phillips, W. 2015,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Map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Trolling and Mainstream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rzybylski, L. 2021, *Hybrid Ethnography: Online, Offline, and In Between*, Los Angeles: Sage.
- Reyes, V. 2020, “Ethnographic Toolkit: Strategic Positionality and Researchers’ Visible and Invisible Tools in Field Research.” *Ethnography* 21.
- Ritter, C. 2021, “Rethinking Digital Ethnography: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faces.” *Qualitative Research* 22.
- Sassen, S. 2002, “Towards A Sociolo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ent Sociology* 50.

- Seaver, N. 2017, "Algorithms as Culture: Some Tactics for the Ethnography of Algorithmic Systems." *Big Data & Society* 4.
- Seaver, N. 2022, *Computing Taste: Algorithms and the Makers of Music Recommend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all, M. & J. Calarco 2022, *Qualitative Literacy: A Guide to Evaluating Ethnographic and Interview Resear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all, M. 2015, "De-Exoticizing Ghetto Poverty: On the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Urban Ethnography." *City & Community* 14.
- Small, M. 2021, "What Is 'Qualitativ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Why the Answer Does Not Matter but the Question Is Important." *Qualitative Sociology* 44.
- Stackpole, T. 2022, "What Is Web3?" <https://hbr.org/2022/05/what-is-web3>.
- Stuart, F. 2020, *Ballad of the Bullet: Gangs, Drill Music, and the Power of Online Infam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dnow, D. 1979, *Pilgrim in the Micro World*,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 Taylor, T. 2006, *Play Between Worlds: Exploring Online Game Culture*,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 Tewksbury, R. 2002, "Bathhouse Intercours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An Erotic Oasis." *Deviant Behavior* 23.
- Tufekci, Z. 2017, *Twitter and Tear Gas: The Power and Fragility of Networked Prot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incent, J. 2020, "NYPD Used Facial Recognition to Track Down Black Lives Matter Activist." <https://www.theverge.com/2020/8/18/21373316/nypd-facial-recognition-black-lives-matter-activist-derrick-ingram>.
- Vogels, E. 2021, "The State of Online Harassment."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1/01/13/the-state-of-online-harassment>.
- Wacquant, L. 2015, "For A Sociology of Flesh and Blood." *Qualitative Sociology* 38.
- Walker, M. 2022, *Indefinite: Doing Time in Jai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 , G. Norcie & S. Komanduri et al. 2011, "I Regretted the Minute I Pressed Share: A Qualitative Study oR regrets on Facebook." in *Symposium on Usable Privacy and Security*, <https://dl.acm.org/doi/10.1145/2078827.2078841>.

Warren, J. 2019, "How Much Do You Have to Publish to Get A Job in A Top Sociology Department? Or to Get Tenure? Trends over A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Science* 6.

West, C. & D.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

Williams, C. 2006, *Inside Toyland: Working, Shopping, and Social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编委会主任：高岩  
编委会副主任：夏桂华 赵玉新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尹航 冯仕政 冯全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吕鹏（中南大学） 吕冬诗  
朱齐丹 汝鹏 苏竣  
李正风 来有为 肖黎明  
邱泽奇 何晓斌 宋士吉  
陈云松 陈华珊 郑莉  
孟小峰 孟天广 赵万里  
赵延东 胡安宁 袁岳  
黄萃 梁玉成 董波  
曾志刚 蔡成涛 璩静  
青年编委：丁奎元 王磊 叶瀚璋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邢麟舟 向维 刘灿辉  
刘松吟 刘春成 刘晓波  
安博 许馨月 孙宇凡  
李子信 李天朗 李晓天  
吴雨晴 何丽 邹冠男  
张咏雪 张承蒙 陈茁  
陈典涵 林子皓 周雪健  
周骥腾 郑李 胡万亨  
茹文俊 贺久恒 贾雨心  
郭媛媛 黄可 梁轩  
曾晨

## 编辑团队

主编：郑莉  
编辑部主任：吴肃然  
编辑部成员：林召霞 王立秋  
李昕茹 李天朗  
岳凤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通大街 145 号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7-209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23-1615/C  
印刷单位：哈尔滨理想印刷有限公司  
创刊年份：2022 年  
出版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  
发行单位：哈尔滨市邮局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邮发代号：14-375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 价：45.00 元

## 投稿指南

本刊面向海内外学者征稿，欢迎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专家学者惠赐稿件。请在来稿首页写明文章标题、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全称、联系电话、详细通信地址、电邮地址等）。文稿需完整，包括标题（中英文）、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正文、参考文献等。所投稿件如受基金资助，请在标题上加脚注说明，包括项目全称和项目批准号。来稿请以中文撰写。

稿件采用他人成说的，须在文中以括注方式说明出处，并在篇末列出参考文献；作者自己的注释均作为当页脚注。中外文参考文献分开列出，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并按音序排列。中文文献参照中文社会学权威期刊格式，外文文献参照 APA 格式。来稿中的图表要清晰，符合出版质量要求，必要时可单独提供图表压缩包文件。

稿件格式请参考杂志官网（<http://www.jis.ac.cn>）“下载中心”中的稿件模板。

投稿方式：请登录杂志官网投稿系统（<http://www.jis.ac.cn>）进行投稿。

## 编辑部联系方式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主楼  
北楼 N301 室，《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  
邮 编：150001  
电 话：0451-82588881  
E-mail: [mailtojis@163.com](mailto:mailtojis@163.com)

## 著作权使用说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络知识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网络知识服务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